

上合組織經濟合作前景廣闊

汪 巍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

在國際金融危機等全球性、地區性挑戰日益增多的新背景下，各國企業的積極參與和區域經濟合作機制的充分發揮，上合組織的凝聚力將進一步加強，對推動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促進中國與中亞各國經貿合作具有重要意義。

2011年6月中旬，上海合作組織（以下簡稱上合組織）峰會將在阿斯塔納舉行，會議將簽署《上合組織10周年阿斯塔納宣言》，該《宣言》將成為上合組織未來一段時期的行動指南。當前，國際形勢正經歷複雜、深刻的變化，把握時代賦予的發展機遇，促進成員國的繁榮振興，成為上合組織成員國的共識。

成立10年來，上合組織區域經濟合作的法律框架、組織機制和發展目標已經確立，合作機制不斷完善，合作規模和合作領域不斷擴大，區域內貿易和投資環境逐漸完善，在上合組織的多邊框架下，中國與中亞各國以貿易投資便利化和大項目合作為主的區域經濟合作邁出實質性步伐，區域內貿易規模逐年擴大，能源、交通、電信、礦產等領域合作逐步加深，合作水平不斷提高，上合組織已經成為中國與中亞地區最重要的多邊合作機制之一。近年來，中國與上合組織成員國的經濟合作呈現出以下發展勢頭。

貿易快速發展 投資規模擴大

經過10年發展，上合組織成員國間經貿關係持續快速發展，貿易量佔各自外貿總量的比重逐年提高。2008年，中國與上合組織各成員國間貿易額達到868億美元。其次，成員國間的貿易商品結構進一步優化，經濟互補性增強。中國機電產品出口成為對中亞、俄羅斯出口快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所佔比重超過30%。在中國進口商品中，資源性商品及原材料超過中國進口總額的70%。10年來，中國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貿易額從121億美元提高到將近900億美元，同比增長7倍，高於同期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增幅。隨着各國經濟穩步發展和內需擴大，中國與上合組織成員國間經貿合作蘊藏的巨大發展潛力將得到進一步發揮。

隨着經貿合作的逐步深入，投資逐漸成為上合組織成員國合作的重要方向。近年來，各成員國積極調整與投資相關的政策法規，投資的社會環境、經濟環境和監管環境明顯改善，相互投資規模迅速擴大，投資領域逐漸拓寬。中國企業通過跨國公司在哈薩克斯坦石油資產的收購、投資開採石油區塊和建設中石油管線等項目，投資金額超過60億美元。上合組織成員國已經成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區域。而上合組織成員國對華投資也不斷擴大，累計對華投資合同金額超過20億美元。

在投資規模迅速擴大的同時，投資領域也進一步拓展。上合組織成員國間的投資領域已由2003年以前的貿易、林業、農業及加工工業，逐漸擴大到資源開發、基礎設施建設、機械製造業、農業及農產品加工、服務業等領域。中方先後承諾向其它上合組織

成員國提供120多億美元優惠貸款，有力推動了成員國之間的多、雙邊務實合作。

能源合作潛力巨大

上合組織成員國中，俄羅斯和中亞四國都是能源非常豐富的國家，能源產業日益成為這些國家國民經濟的支柱。能源合作是上合組織成員國間增強互信、互利共贏的重要內容。2003年9月，上合組織成立經貿部長會議高官委員會和有關方面的專業工作組，為區域經濟合作各項目標的實現提供了機制保障。此後，各成員國圍繞《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多邊經貿合作綱要》，在能源領域確立了19個項目，開展雙邊和多邊合作。能源資源的互補帶動了各國經濟發展和交通運輸、基礎設施建設、能源消費結構以及人民生活的改善。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正式開通，標誌着中國與包括上合組織成員國在內的中亞地區的合作共贏取得重大進展。

共同應對金融危機 加速經濟發展

席捲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給上合組織區域經濟合作帶來壓力和挑戰。隨着外資大量撤離，部分上合組織成員國出現資金短缺，項目投資銳減，失業增加。面對複雜形勢，上合組織主動協調各國立場，密切交流，攜手合作，共同應對挑戰，在促進地區安全穩定、繁榮區域經濟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2009年6月，在葉卡捷琳堡峰會上，上合組織各方就共同應對金融危機達成了原則共識，胡錦濤主席還宣佈中國將提供100億美元信貸支持，為上合組織成員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作出努力。

目前，上合組織各國經濟持續發展和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提高，為中國與這些國家的國際經貿合作創造了良好的經濟基礎和制度環境，上合組織區域經濟合作具有廣闊前景。與此同時，由於各成員國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大、融資缺口較大等不利因素，上合組織區域經濟合作仍然面臨諸多挑戰。

儘管國際金融危機對各成員國和上合組織產生一定影響，但綜合各方面因素看，危機也給區域經貿合作帶來機遇。首先，各成員國應對危機的經歷和經驗，共同應對挑戰和克服困難的決心將進一步增強上合組織凝聚力。其次，為了刺激國內消費和提振經濟，各成員國全面加快了區域基礎設施建設，客觀上促進了上合組織「發展網絡型基礎設施建設」戰略決策的落實。第三，各成員國重視經濟結構調整，努力提高經濟質量，為上合組織今後擴大合作領域和規模奠定了堅實基礎。

獲得了滿足。但不知這個行為是否與黃毓民發生利益衝突，導致日後與黃的決裂。事實上，當時隨同陶君行一起赴美的吳文遠、李詩傑，正是社民連後來內訌的「主角」。

香港政治組織成立「北美分部」太過敏感，民主黨、公民黨從不敢言之於口，社民連卻敢直接提上議程。正如有質疑者稱，社民連有了「北美分部」不僅是因為選舉需要，更與隱藏在其背後的支持力量有關。有一個問題社民連至今也沒有講清楚：如此頻密的示威，活動經費從何而來？

顧問公司或是收錢窗

去年10月13日，陶君行悄悄註冊了一間私人公司，名為「惠譽商務顧問有限公司」（Value Plus Corporate Consultancy Limited）。這間公司註冊地址位於灣仔的一幢商業大廈之內，其實是一間「空殼」公司。經實地考察，上址不僅沒有任何該公司標誌，而且與陶的另一間公司「惠譽執業會計師有限公司」共用同一地址。行內人士講，這類顧問公司生意界十分模糊，幾乎任何事務都能夠搭上「生意」。對陶君行而言，多了這間「空殼」公司，日後的生意就不僅限於提供「會計」服務，生意面可以更為廣。

無獨有偶，陶的「親密戰友」、現任社民連內務副主席吳文遠，也在去年註冊了一間私人公司，名為「企業策略顧問有限公司」（Corporate Strategy Consulting Co.Limited）。社民連兩名掌舵人都在從事「顧問」業務，而社民連從此不再缺乏資金從事政治活動，私人公司真的同此無關嗎？

今年1月23日社民連分裂，精神領袖黃毓民出走，照理說社民連應該元氣大傷，進入整頓期。但令人奇怪的是，社民連反倒更加活躍，而且示威遊行更具針對性、更有破壞力。如前所述，4個月內進行了逾50次示威遊行。除了每周一次到中聯辦示威遊行，支持所謂的「中國茉莉花革命」外，其他凡是和內地政治扯上關連的事件，例如艾未未、劉曉波、反核電等，社民連人員無一例外都會出現在街頭。5月國際勞動節假期，社民連共搞了7場集會遊行，陶君行因此向傳媒訴苦道：「4日假期，3天都在街頭示威，不累才假！」

對於一個政治組織來說，遊行示威可能是家常便飯，但家常便飯也需要有資金才能運作。每次一二十人的交通、伙食津貼，以及遊行所需要的道具，花費可能幾千至上萬元。「小數怕長計」。累計金額，50次的費用就不是小數目了。以社民連的規模來說，這無疑是一筆很大的開銷，沒有持續外來的進賬是難以為繼的，投入區議會、立法會選舉就需要花費了。據不願透露姓名的前社民連成員表示，包括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在內的反對派，沒有一家是不收取政治捐助的，當中也不乏一些非本港的政治捐款，他還說：「區別在於，社民連太過冒進，有人太想急於表現自己，反倒露出馬腳。」

社民連到底收了誰的錢？背後有何不可告人的秘密？想必陶君行把持的社民連行政委員會不敢、也不會去說明真相。但對於市民來說，這已是公開的秘密，不用過多解釋。陶君行等過去因為共同的目標和黃毓民搞在一起，今天又可以因為利益分歧而割席，甚至不惜惡言相向。當中緣由，並非政見不同，只是利益之爭。社民連今天的情形，與海外民運分子的狀況如出一轍，最初因「利」而合，最後因「利」而散。

（本文轉載自6月號《紫荊》雜誌。）

黃毓民搗亂議會不知廉恥

美 恩

黃毓民及其公民黨友去年搞的「補選公投」，最終落得慘淡收場，兼且連累社會付出沉重代價。如今以遞補形式代替補選議員更證明是合情合理的，可以杜絕議員辭職再參選的鬧劇再次發生，尤其是對付那些不知所謂、不知廉恥的議員。

政府為免議員辭職再參選的事件再次發生，建議修改選舉條例，以遞補形式代替補選，在立法會動議二讀進行期間，發言「預咗坐監」的「人民力量」黃毓民再次發難，趨前干擾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粗魯推跌局長的講稿，並且大罵林瑞麟「無恥」、「賤人」、「狗奴才」，兼且想「擒住佢（林瑞麟）」，攔佢一巴，幸得七名保安合力阻止，並且依照代主席劉健儀指示即時驅逐黃毓民出議事廳。被拉離場時，黃毓民還是心生不忿說着：「我一定唔會放過你」。

補選公投慘淡收場 虛耗公帑

黃毓民之所以如此激動，是去年那個「變相公投」正是他有份發起的原因吧。可惜這項活動既得不到部分反對派中人和建制派支持，亦得不到市民響應，結果投票選民只得50萬，不投票的卻是270萬，投票率只得17%，打破回歸以來最低紀錄。「搞事五子」最終以「低票勝出」重返立法會，白白虛耗公帑1.6億。從事件之中，我們知道「搞事五子」這班人自大、天真兼有腦，以為凡事一廂情願、自把自為，就有人與他們相唱和，怎知事與願違，落得慘淡收

場，兼連累社會付出沉重代價。投票結果的慘淡收場，正好反映市民對他們此等兒戲搞作表示厭惡，市民的原期望是想透過心儀議員的一張嘴去表達訴求，誰知遇人不淑，他們竟然聯袂結隊辭職，違背了選民的原有意願，亦破壞了他們最初對立法會的原有承諾。反對派口聲聲遞補機制剝削選民投票的權利，他們何嘗不是糟蹋了選民的期望？

以遞補制代替補選防議員搞事

黃毓民表示「選舉遞補機制」是回歸以來最粗暴的法案，不可以讓條例「鑑粗」通過，他何嘗不是回歸以來最粗暴的立法會議員，每每「鑑粗」搗亂立法會？所謂「五區公投」慘淡收場，何嘗不是代表着市民不滿他們「鑑粗」離開立法會再選，「鑑粗」浪費公帑1.6億嗎？黃毓民罵林瑞麟「賤人」，「搞事五子」何嘗不是「犯賤」。有議員不當，折騰自己走出去玩一個毫無忍受性的遊戲，然後面帶憤憤地返回原有議席。更無恥的是，他們並不認為自己失敗，竟然還有人夠膽說自己「勝利」！他們「鑑粗」辭職，「鑑粗」說自己勝利，乃雙倍的無恥。

「搞事五子」的無聊搞作，大刺刺地浪費公帑，很多市民都想「擒住佢咗，攔佢咗一巴」，惟沒有人付諸行動，原因是市民知道，動粗是無禮表現，會令自己和認識的人感到羞恥，可憐「黃郁人」和其「豬朋狗友」卻毫無羞恥的心，輸了又不認，動粗亦不覺得是甚麼一回事，又不懂得自我反省，他們的舉動比很多坐監的人還要粗魯，這班搞事分子在立法會，肆意做騷搗亂，不務正業，譁眾取寵，惟香港人已經到了反胃。

毫無疑問，以遞補形式代替補選議員是合情合理的，尤其是應付那些不知所謂、不知廉恥的「所謂議員」。

最低工資均富還是均貧？

祝越山 獅子山學會

最低工資實行已經一個月，職工盟向傳媒表示有10萬名僱員因此受惠，獅子山學會卻只見每天翻開報章都能找到最低工資下的傷心故事。

當中有人被取消雙糧，亦有人被減工時，最悲哀的卻是失業，而受害最深的往往是我們最應該幫助的弱勢社群。早前已經有殘疾人士被解僱、盲人工場僱員被減工時；近日再有老字號酒樓因最低工資而被迫結業，使六十名員工頓成失業大軍。根據報道，這間酒家的工資成本在最低工資之後由每月五十萬急增至七十多萬，而每月租金卻不過九萬元。結果是在原來已經沒有多少盈利，甚至需要虧損的情況下，老闆選擇結業離場。最低工資無疑正是這間酒家倒閉的致命一擊。

最低工資之前，工會不斷指商人經常剝削工人，以謀取最大利益。事實的確如此嗎？最低工資之後，有不少餐廳表示就算時薪高於28元都難以請人。或許有人會問，那為何不出更高價錢去招聘？30元不夠，40元不夠，為何不出50元？

弱勢社群就業更難

事實是，這個工作都需要創造價值。如果老闆認為那個崗位每小時只可以創造40元的價值，他們是絕對不會以50元去請一名員工。工資是一個價格訊號，代表那員工，那個崗位可以創造的價值。人為地把價格強行扭曲，結果只會把勞工市場同樣扭曲，最後卻永遠是最弱勢的社群受到最深的傷害。最低工資使他們失業之後，他們又可以如何跟其他人競爭？

公共政策之兩難

單仲偕

到最深的傷害。最低工資使他們失業之後，他們又可以如何跟其他人競爭？

既然無論如何都要付出28元，為何老闆不請一個真正可以創造28元的人？請一個年輕力壯的，總比請一名老人家、殘疾人士好；結果是將來長者的失業率一定大幅上升。

今天的經濟環境不俗，最低工資的影響尚未完全浮現。但已經可以經常找到有老人家、殘疾人士被解僱，年輕人找工作亦已較以往困難。他朝經濟衰退之時，誰又可以保證不會出現大量失業的情況？

可以預期，最低工資只會淪為另一個有加無減的機制。經濟好時加薪，經濟不好時亦不應減薪。結果是中小企慢慢消失，機器慢慢取代人手。到最後，老人家、殘疾人士永遠都找不到工作，年青人亦找不到學習的機會，長期被排除在職場之外。失去了工作的機會、能力，年青的長期無法向上流動，徘徊在社會中下層。受苦的，原來還有我們的兒子和孫子。

被解僱的酒家員工中，有一名已經為人祖母的女工，原希望在最低工資實施後，用獲加的工資為孫子買一些玩具，以分享這份喜悅，今天卻好夢成空；「均富」的期望，落得「均窮」的結局。最低工資原來不是對基層的保護，不過是對基層的摧殘。

現在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在問題真正浮現之前盡快取消最低工資。但有政黨願意面對現實，提出廢除最低工資嗎？

類似的選擇在公共政策的決策並不罕見。就像最近機場管理局公開諮詢興建第三條跑道一事，也見這些決定的困難。香港機場的客運及貨運量自九八年啟用至今已倍數增長：九八年，客運量只是2900萬人次，但到了2010年，客運量已增至5100萬人次，增幅超過七成半。興建跑道的確會影響環境，倘若新的跑道根本毫無需要，筆者當然反對。然而，若真的有如此多人要進出香港的話，我們要決定的，就是哪一種方式比較划算、比較環保。若來港的人士不搭飛機，就只有靠火車和汽車從內地入境，或是靠輪船從南中國海入境。輪船顯然不能應付香港這個商業社會所需，至於火車和汽車，是否真的比飛機環保？會否只能應付從大珠三角附近到港的旅客？從華北或歐美到港的旅客又如何呢？

公共政策沒有完美，說到底，我們必須要在各種限制中，尋找一個可行而平衡的方案，每一個政策都是不同人士的「人生交叉點」，政府擔當的角色，應該是盡力坦誠地解釋不同方案的利弊，從而與民間達成共識，這才是以和諧社會為目標的施政方向。

誰在資助社民連？

路羽翔

不是「窮人黨」而是「富貴黨」

社民連很長時間不是一個富有的政治組織，從2006年成立之初時，即已表明該組織是代表基層的。雖然其激進的抗爭手法贏得某些市民的支持，但畢竟無法成為主流的政治組織，其財力更不可能和民主黨、公民黨同日而語。然而，偏偏就是這麼一個自稱「窮人黨」的團體，過去每次選舉的開支卻是大得驚人。以2008年立法會選舉為例，該組織豪花528萬港元，最終取得三個席位，平均每個議席開支176萬港元，是立法會所有政治組織中的次高（第一為公民黨，平均每席開支186萬港元）；當年陶君行參選費用高達140萬港元。

如此龐大的開支從何而來？社民連對此常用的解釋是：市民的零散捐助、六四活動及年青攤位賣貨所得。但這種解釋很難令人信服，以今年年宵攤擺賣為例，這個社民連視為最重要的籌款方式，最後僅獲15萬港元，創歷年新低。事實上，背後如果沒有龐大的資金支持，沒有大筆的政治款項，社民連連日常運作恐怕都成問題，更不用說是耗資數百萬元的參選。

社民連從成立一開始，就不諱言會與外國勢力保持接觸，其中包括一些駐港領事館官員、海外民運組織、法輪功成員、「台獨」和「藏獨」分子等。如果認為社民連的行為只是為了譁眾取寵，那就未免太小看他們了。事實上，該組織成立4年來，頻頻與外國勢力接觸，在去年「五區總辭」前後更為明顯。有分析說，通過接觸，社民連能夠直接或間接獲得必要的資助和策略性指導。

2010年8月，社民連主席陶君行率領副主席吳文遠、秘書長李詩傑，前往包括紐約、洛杉磯、三藩市、溫哥華及多倫多在內的6個美、加城市。表面目的是為宣傳社民連的政見，但還有不為人知的「任務」。一如陶君行返港後向傳媒所表示的，此行共獲得4個成果：一、見了包括王軍濤、吳仁華等在內的海外民運成員；二、成功招攬40名海外年輕新成員，當中數名年輕人有參與今年區議會選舉；三、社民連籌備在北美地區成立支部；四、共籌得超過10萬元捐款。有必要在北美設分部嗎？

據一位前社民連成員透露，陶君行等美、加之行，不僅見了眾多民運人士，還見了美國一間「半政府機構」的人員，並要求獲得資助。當時的確是